

人民日报 名家自述系列  
中华文化复兴方阵

问学集  
严家炎自述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人民日报  
名家自述系列  
中华文化复兴方阵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n elderly man with glasses, wearing a suit and tie.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of the camera with a thoughtful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问学集  
严家炎自述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学集:严家炎自述/严家炎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115-2226-9

I. ①问… II. ①严…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0152号

书 名:问学集:严家炎自述  
作 者:严家炎

---

出版人:董 伟  
责任编辑:银 河 陈志明  
封面设计:汪要军 陈淑平

---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010) 65369514  
网 址: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1/16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16.5  
印 次:2014年1月 第1版 2014年1月 第1次印刷

---

书 号:ISBN 978-7-5115-2226-9  
定 价:38.00元

中华文化复兴方阵

严家炎

2011.10.24

严家炎先生“中华文化复兴方阵”手迹

# 目 录

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	5
一 从可疑之处入手，凭原始材料立论·····	6
二 着眼于艺术而又饱和着思想的小说评论·····	12
三 清源方可正本，求实乃能出新·····	15
四 现代小说流派史的研究和写作·····	21
回忆·感想·希望	
——为《我与文学评论》一书作·····	27
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	35
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二·····	52
一种曾经广为流行的评价标准的偏颇·····	55
现实与历史的“双重评价标准”能否成立？·····	58
决不要以作家政治身份代替作品客观评价·····	62
还是要从总的倾向上把握和评价作品·····	64
美学评价与历史评价不可偏废，必须统一·····	65

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三·····	70
论世而后知人，顾全方能通篇 ——鲁迅研究的一点感想·····	82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88
有关文化生态平衡的思考·····	98
区域文化：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	101
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设想·····	108
我为什么要研究金庸？·····	113
文学史分期之我见·····	119
区域视角与鲁迅研究·····	126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随想·····	138
批评规范小议·····	148
七十自述·····	154
在我记忆中的慧修师·····	158
附：导师杨晦、钱学熙先生为一九五六级文艺 理论研究生规定的必读书目·····	164
心中的丰碑 ——怀念王瑶先生·····	171
悼念文学史家唐弢先生·····	175
附：唐弢先生为中国现代文学青年研究者开列 的刊物与作品目录·····	179
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187
精神上的导师 ——我印象中的李何林先生·····	195

忆子铭兄·····	200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序言·····	207

## 附 录

严家炎先生大事年表·····	217
----------------	-----





## 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

我从小喜欢文学。诗和小说都让我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高中二年级（一九四八年秋）在上海地方报纸上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后，莫立了一生要与文学结缘的志向。从此，“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真成了我奉献的信条和毕生的体验。

上海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解放。那个暑假，我们吴淞中学高中部八九个喜欢文学的同学，自动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阅读和讨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荃麟、葛琴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我们都相信：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次年暑假高中毕业，我为了圆文学之梦，竟违背家长要我进正规大学的愿望，上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先后参加淮南淮北的四期土改，又经历了农村建互助组和铜矿扩建改建的较长时间工作锻炼，连续过了六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的刻苦生活，积累了若干素材，写了一部分作品草稿和大量笔记。

然而，一九五五年突发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那场严酷的政治风暴，使我极度震惊。我实在无法理解，一群向来被公认为进步的作家，其中还有不少党员作家——也包括我在华东革大时的教务处长、很受学生尊敬和欢迎的老师刘雪苇在内，何以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一些私人通信，又怎么会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证”？我不禁感到事情的可怕，并陷入痛苦的沉思。于是，在一次政治学习会后的晚上，我撕毁了那几年写的一部分感情内容可能被指为“不健康”、“有问题”的草稿和笔记，第二天还向党组织交出了我收藏的胡风、路翎和雪苇的几本著作，如胡风的《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论现实主义的路》，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雪苇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我决心要变换自己的环境和道路。一九五六年，恰好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动员知识青年读大学、读研究生，我便在这年九月以同等学力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艺理论方向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从此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之路。

## 一 从可疑之处入手，凭原始材料立论

就在我研修了两年文艺理论专业课程，并逐渐明确了今后的研究方向之时，一个突如其来的任务让我再次转向。一九五八年十月底，因中文系急需教师，我被半途从研究生岗位上调出，准备寒假后为苏联、东欧、蒙古、朝鲜等国二十多名留学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这不仅是岗位的变更，而且是专业方向的改动，意味着我必须从头做起。我

只能结合自己的备课，采用一种较为简便的办法来开展研究工作。这就是：抓住阅读中发现的一些可疑之处，紧追不舍，尽可能充分占有相关材料，深入开掘，最终获得成果。我之所以在最初阶段多取这种方式，也许跟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有关。

在两个月备课过程中，我首先读了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年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的“参考书”），不久又从旧书店里买到王瑶先生一九五三年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sup>①</sup>上册；还翻阅了丁易等其他两三种相关的书。我发现五十年代前期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为了贯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断，往往在来不及阅读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就把一九一六年酝酿、一九一七年兴起的文学革命当作“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划入“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时期”，认为陈独秀、李大钊当时都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我对此说持怀疑态度，于是连续二十多天到北大图书馆去查阅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〇年间的《新青年》杂志。这是我第一次去接触《新青年》，我阅读了这个刊物上所有署名陈独秀或以“记者”名义发表的文章，还读了李大钊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的论文以及其他相关文章。这番阅读不断带给我许多惊喜。我终于坚信：一九一八年以前，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都还只是激进的民主派，并未接受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

<sup>①</sup>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因较多引用胡风的论述、在一九五五年胡风案件后当然失去了成为“参考书”的资格。其实这部书写作时间惊人的短促，内容却相当丰富充实，动用了作者长期关心新文学发展而形成的学术积累，虽然尚有若干疏简错失之处，但无愧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

一九一六年，还曾经幻想中国应该走德国军国主义的道路。直到十月革命胜利，芬兰、德国、奥地利革命发生，接着是欧战结束之后，李大钊、陈独秀才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而陈又比李晚了一年左右。我不仅弄清了两位重要人物思想转变的具体事实，还考察了一九一八年以后《新青年》文学活动的若干新因素、新变化：一是《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成员增多，陈独秀之外，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先后参加工作，“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sup>①</sup>，因而声威大振；二是涌现出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月夜》《鸽子》《小河》等一批出色的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学开始在全国推开；三是先进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学的重视和研究已极一时之盛，诚如瞿秋白所言：俄国文学几乎“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sup>②</sup>。我认为，这些正是文学革命向新民主主义方向逐步转化的标志。我将这些想法连同稍后发现的若干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材料，写成一篇题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的文章初稿，给学生讲述了我的意见。后来经过修改，曾作为五四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在会上发表，并刊载于上海《文艺论丛》第八辑。当时颇得会议主持人李慎之先生和一些与会学者的赞誉，认为材料充实，分析细密，相当有说服力，使课题研究深入了一步。

我研究五四文学的另外一些文章，也大多采取这种从疑点入手的方式。例如，陈独秀的“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真像有的学者所说，要“打倒”中

<sup>①</sup> 见《编辑部启事》，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一九一八年二月。

<sup>②</sup>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北京，新中国杂志社一九二〇年出版。

国的“古典文学”吗？那么《文学革命论》中为什么又对国风、楚辞、汉魏五言诗、唐代古文运动、元明戏曲、明清小说等给予高度评价，并对胡适所说“诗至唐而极盛”的提法也表示赞同？这在逻辑上怎么说得通？我经过长期反复思考，又对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以外的大量文章尤其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通信细读、研究和考辨，并联系陈独秀对欧洲古典主义文学的态度，终于得出结论：陈独秀所要“推倒”的“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实际上是指形式刻板、声律极严的骈文、律诗（尤其长律）以及桐城末流等一味“仿古”的文学形态，也就是他称做“中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东西。于是，我写成《〈文学革命论〉作者“推倒”“古典文学”之考辨》一文。这个答案至今已被许多学者所认可。

又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而首开风气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林先生认为，正是由于五四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带来了中国意识的危机，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疾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对于林教授这种观点，我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者和十年“文革”的亲历者，当然无法赞成。我觉得，林先生无论对五四或对“文革”都了解得比较表面，因而撰写了《五四·文革·传统文化》一文，后来又补充、扩展为《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考辨》的论文。我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新青年》在帝制复辟声浪甚嚣尘上的年代，起来批判儒

家的“三纲”，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以启蒙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有着巨大的功绩。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判断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以致造成“断裂”这种说法，在三个层面上都是说不通的：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这百家中的一家当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第二，这种说法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全盘；第三，这种说法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内部，原本就有王充、李卓吾、黄宗羲、戴震等非主流的“异端”成分存在，五四新文化就是继承和发扬了儒家内部这些“异端”成分的。我还论证了：“文革”与五四恰好是反方向的运动。五四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是为了反对愚昧迷信。而“文革”，恰恰在上层是个人专制变本加厉，在下层是个人迷信极其盛行的产物；它表面上是打倒一切，对“封资修”文化全面批判，实际上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回潮。“文革”对于五四，是严重的反动和倒退；对于中华民族，更是一场少有的人为灾难。我所发表的这些看法，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赢得了不少赞同的声音。

总之，这种由发现疑点而起步的研究方式，似乎是一种舒卷两便、灵活可行的模式，它能适应多种不同的范围。大到一场文化运动的评价，小到半句文学口号的理解，都可采用这种方式应对。我的有关五四的多篇论文，便是这样产生的。

在这类研究过程中，最终决定着成果质量的，是作者占有相关原始资料是否充分。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时，主编唐弢先生一再强调：要“翻阅期刊，以便了解时代面貌和历史背景”，“作品要查最

初发表的期刊”，还开列了几十种最重要的文学期刊名单。这对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学者的成长确实极有好处。在两年多时间里，我先后阅读了近二十种文学和文化的期刊，留下了至今还保存着的十几万字的笔记，弄明白了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难问题。举例说，朱自清的《赠友》一诗，歌颂“手像火把”、“眼像波涛”、“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革命者，这对于说明作者的思想 and 交往应该说都很重要。但他所赠这位友人到底是谁？原诗发表于何处？都不清楚。我翻阅了二十年代初期的一些期刊，发现此诗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二十八期上。在此之前四个月，《中国青年》曾刊登过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其中引录了他自己所做的两首旧体诗，正是表达了“共产均贫富”的理想。那么朱自清赞颂的这位友人，也许就是邓中夏了。然而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尚不能确切地证实。及至进一步了解到朱、邓二人都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文科学生，虽然朱在哲学系，邓在国文系，却都是一九二〇年毕业的，完全可能是熟识的友人；至此，这种可能性更有所增大，却还不能真正落实。我又从朱自清将此诗收入《踪迹》集时改题《赠 A. S》方面查找线索，想弄清 A. S 是谁。经过苦苦寻找，总算从《红旗飘飘》上看到一篇回忆文章，说邓中夏一九二三年在上海大学工作时，曾改用“邓安石”的名字，正好符合 A. S 的英文拼音，这才算一切口径都对得上，终于获得定论。我之所以能从一九六三年八月起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发表《朱自清与邓中夏》等几篇文章，可以说正是全凭大量阅读原始资料的结果。

## 二 着眼于艺术而又饱和着思想的小说评论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艺报》为了培养文学评论队伍,邀我当了业余的评论员,此后经常接到一点编辑部交来的任务。虽然这近于“命题作文”,但我总是首先坚持从艺术角度对作品加以考量:看看它能否真称得上是语言的艺术,看看它能否真正吸引和打动自己。在我看来,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赖于它是艺术。思想只能渗透于艺术之中,不能游离在艺术之外。脱离了艺术的思想,是干枯无生命的思想,根本打动不了人。真正的文学,总是能通过自己的艺术去吸引人和打动人。因此,我总是试着要将阅读作品第一遍的感想写成笔记。“我非常看重这读第一遍的印象和感受,认为它不仅是文学评论必需的素材,而且是正确地开展批评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人们常常说要把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结合起来。我认为这种结合的关键,首先在于从纯欣赏者的角度去读第一遍,以便为整个批评建立比较牢靠的审美基础。”<sup>①</sup>评论,就是在读者和作品之间搭起桥梁,真正让作品与读者做到“融通”和“不隔”。而要做到这一点,便须体察人情,体察生活,熟悉自己所要熟悉的那些生活内容,并有自身的真知灼见。正当多位评论家撰文赞许《创业史》塑造的新人形象梁生宝获得重大成就时,我也写了一组评论这部作品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发表于《文学评论》上的《谈〈创业

<sup>①</sup> 见拙作《回忆·感想·希望——为〈我与文学评论〉一书作》一文,《文学评论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曾予转载。收入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六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出版。



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一文中，我指出：《创业史》里最成功的形象不是别人，而是梁三老汉；他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我通过对梁三老汉这位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有一块“死肉疙瘩”的老农层层深入的分析，细致地解剖了他在合作化运动中的两面性，以及由其贫苦地位和经历所决定的最终要向社会主义靠拢的必然性。我认为：梁三老汉在第一部中是真正完成了的形象，“由于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熔铸了作家的幽默和谐趣，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和诚挚感情，因而它不仅深刻，而且浑厚；不仅丰富，而且坚实，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据《文学评论》编辑部张晓萃女士说，一九六一年秋天她到长安县柳青家中采访时，柳青对该文表示赞赏，认为它对梁三老汉形象的意义阐发较深，甚至连作者某些很隐微的想法也都精细地触及到了。冯牧当年秋末在《文艺报》一次会后留下颜默（廖仲安）和我，说到作协领导同志（指荃麟）对评论梁三老汉形象的这篇文章给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写得有深度。唐弢先生则向吕启祥等几位当时的青年学者说：“好文章要写出气势，论梁三老汉形象这篇文章就确实有气势。”<sup>①</sup>新时期出版

---

<sup>①</sup> 这里还有一则小故事：一九六一年九月，教育部人事司已与北京大学方面商定，派我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任教两年，接替即将回国的冯钟芸先生，并已为我预订了去欧洲的火车票。那时，唐弢先生刚被确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他坚决反对将我放走，要求教育部给予支持。最后，教育部同意了唐的主张，我就回到了教材编写组。唐弢先生曾两次向我道歉，我则感谢他给了我很好的学习进修的机会。围绕《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一文，一九六四年批判“中间人物论”的运动和十年“文革”中，都发生过许多可悲、可笑、可叹、可气、可歌、可泣的难以尽述的故事，而荃麟同志表现的那番独自承担厄运、决不谄过于年轻一代的傲然挺立的风骨，则令人永远钦敬。